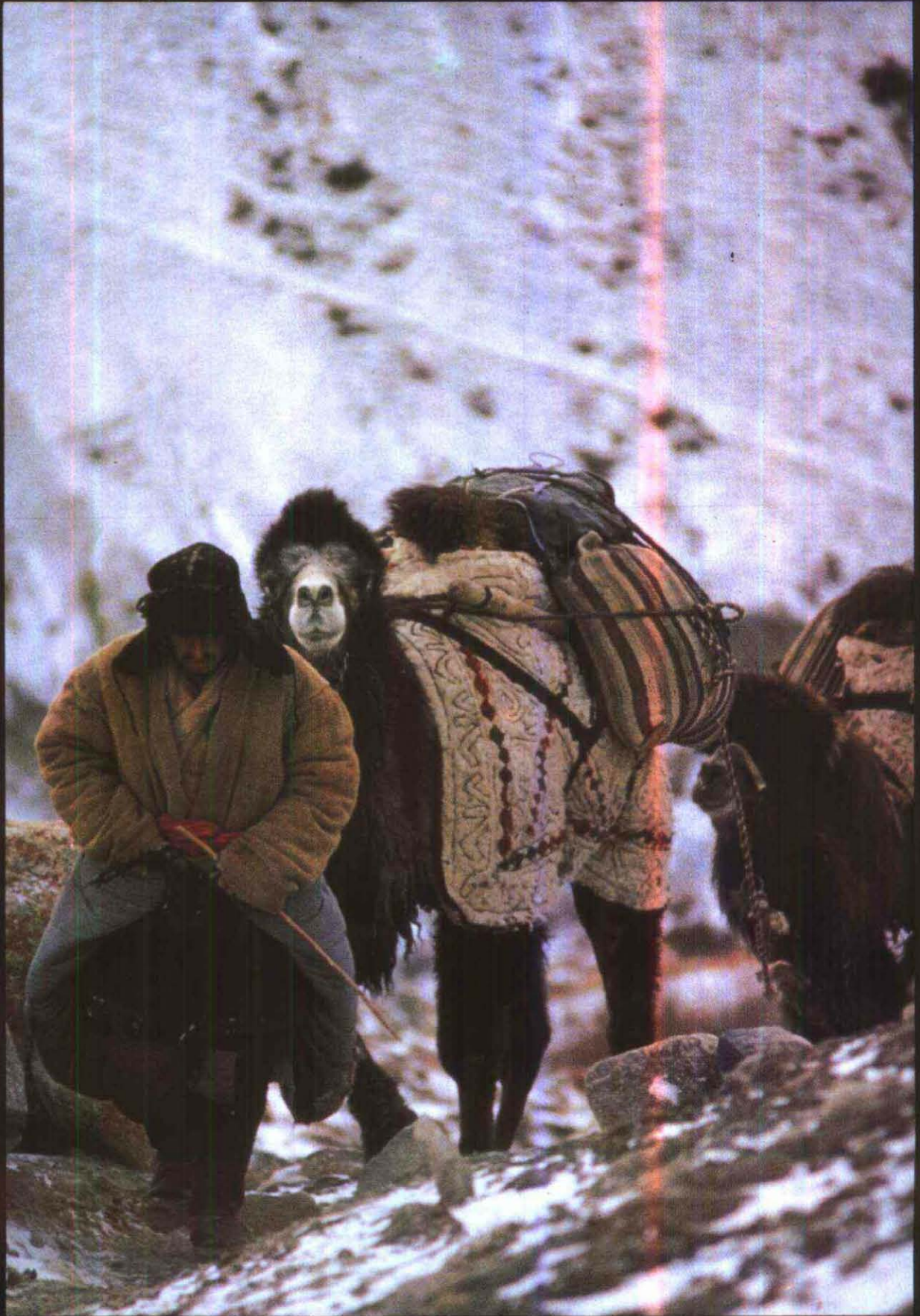


丝绸之路 • 东方和西方的交流传奇（下）









“**教**皇大人是所有基督徒的领袖。

如果蒙他恩典,派遣一位主教去见那些人,

驳斥他们三次给法兰克人(Francis)

信上所写的蠢话,

便可以向他们宣示教皇的意思,

同时也能得到他们的书面答复。

因为凡是一位使节想说的话,

他们都肯听,而且总是问他想不想再说下去。”

吉尧姆·德·吕布鲁克

(Guillaume de Rubrouck), 1254 年

第五章 传教士的时代



日曼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

(Frédéric II)激烈反对教皇,因而两次被开除教籍。在 1245 年于里昂召开的宗教评议会上,教皇英诺森四世终于废黜了这位皇帝。此次宗教评议会的主题之一,是对付蒙古人入侵。



在 13 和 14 世纪,丝绸之路向西方商人开放的时代,宗教使团也在这条路上奔走。正如从前的佛教一样,天主教也借助于贸易交流而进入了中国。

为了向蒙古人传教,从 13 世纪中叶起出现了传教的使团。他们最初的目的,是促进罗马教会和东方教会的关系,并促使亚洲的异教民族改宗。

罗马教会走上通往东方的道路

1241 年,窝阔台大汗去世。这时蒙古军队已经打到多瑙河,由于大汗去世而暂缓攻势,一部分军队撤向东方。基督徒十分害怕蒙古军队,把它当成了预言家埃



“**教**廷委托我们到鞑靼人和东方其他民族那里去的时候……我们首先上路往蒙古去。我们当时对鞑靼人威胁教会感到害怕。担心此去会丧命或被俘,担心沿途会饥渴难忍,不是寒风刺骨,便是烈日当头。即使不死或被监禁,也会遭到我们无法承受的痛苦和侮辱,及从未有过的考验。但是我们不敢违背上帝的旨意,也不敢逃避我们的任务。无论如何,我们要为基督徒做好事。”

让·德·普朗·卡尔班

瑞希尔(Ezéchiel)所说的“戈格”(Gog)和“马戈格”(Magog)民族,“所有的人都骑着马,庞大的军队无穷无尽……就像覆盖在大地上的烟云……”然而恐慌逐渐消失,他们开始努力要建立关系。1245年,教皇英诺森四世(Innocent IV)定派人到蒙古人那里去,试图缔结和约,并设法使蒙古人改宗。

一项使命交给了方济会修士让·德·普朗·卡尔班(Jean de Plan Carpin),另一项使命由多明我会修士阿瑟兰·德·克雷莫纳(Ascelin de Crémone)和安德烈·德·隆居莫(André de Longjumeau)负责。这两个多明我会修士,把教皇的信件交给蒙古的前锋部队后,便不再往前走。克雷莫纳还因为不肯按照蒙古人的习俗,跪在前锋部队的巴伊基汗(Baiju)面前,而差点送了命。巴伊基汗在回信中要求

教皇亲自去见大汗,认为只派这两个人来,使他感到震惊和侮辱。



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在鞑靼帝国进行调查

年近60岁的卡尔班,于1245年4月带着一位教友从里昂出发。到了波兰的布雷斯劳

(Breslau)以后,有个修士和他同

行,充当译员。他利用鞑靼人建立的驿站系统,在蒙古人的领土上旅行,一天之内可以换五、六次坐骑。他于1246年7月到达喀喇昆仑山,参加了贵由汗的加冕礼,得蒙接见,并收下一封回给教皇的信。不过,他的使命并不比那两位多明我会修士成功多少,因为贵由大汗要求教皇归顺。卡尔班于11月份从原路返回,



由可汗致教皇英
诺森四世的信
(1246)。

一年后回到里昂。

不过由于这位传教士搜集的资料丰富,他的这次旅行仍然十分重要。他的《蒙古人历史》不只是一部游记,也是一部调查报告,在离奇传说之外,还提供了一份关于蒙古人的珍贵的人类学见证。他尤其注重战争问题,在书中详细列举了蒙古人作战的各种手段。在他看来,战胜蒙古人比使他们改宗更为重要。而他认为,西方人该起来保卫处于危险之中的基督教民族。这呼吁却一直没有得到响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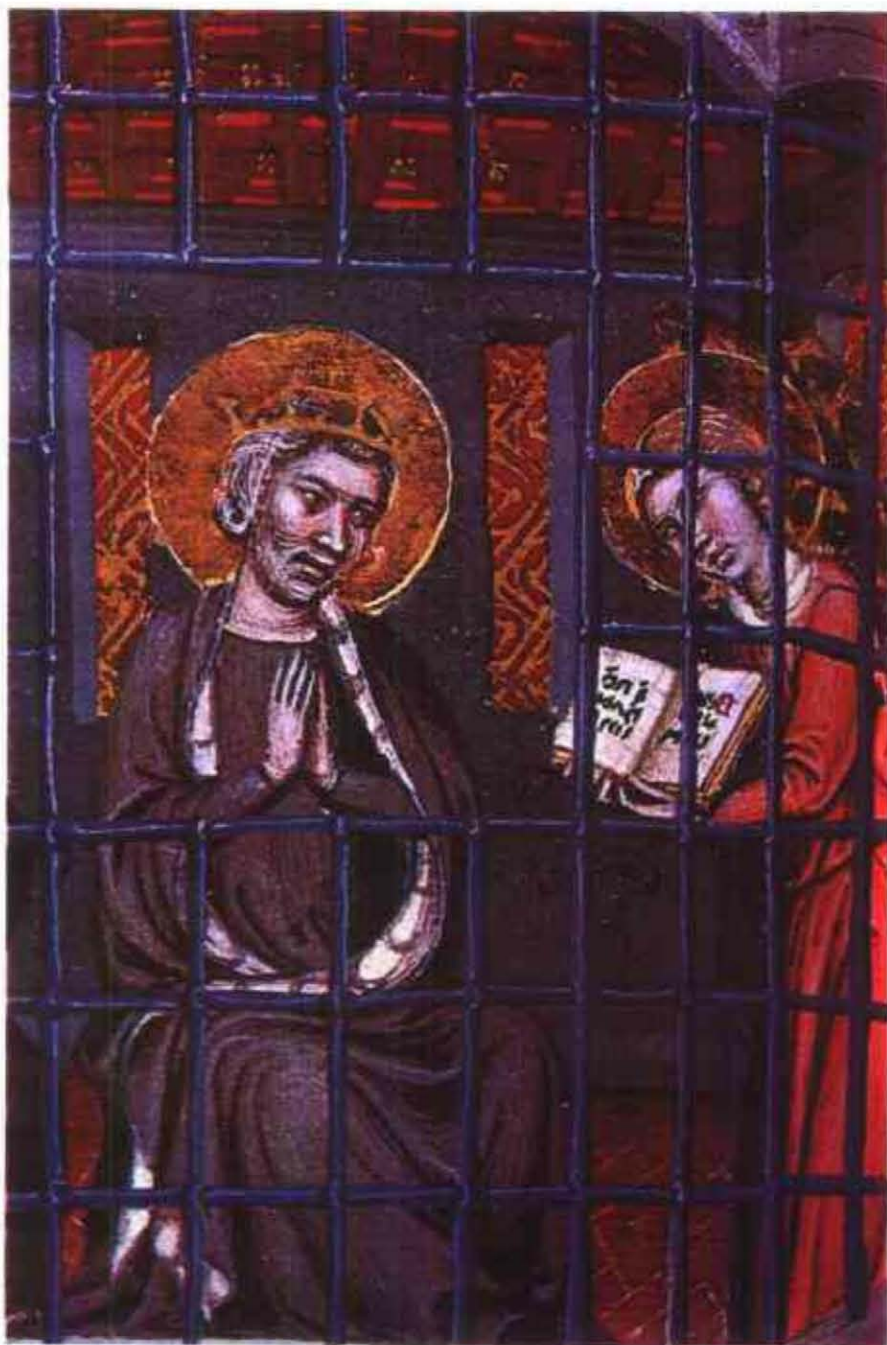
吉尧姆·德·吕布鲁克 向蒙古人传道

继卡尔班之后,圣·路易为了拉拢和蒙古人的关系,也派出使者。他首先派了安德烈·隆居莫。隆居莫从中东回来后,于1249年又从圣·路易所在的塞浦路斯岛屿尼科西亚(Nicosie)和两个多明我会修士一起出发。但是贵由大汗已经去世,摄政的海迷失皇后也不在喀喇昆仑山,而是在哈萨克的巴尔喀什湖(Balkach)附近。隆居莫得到的回信措辞十分严厉,信里头命令法国国王效忠蒙古人,并且要进贡。圣·路易决定再派一位密使。他找了亲信吉尧姆·



“**传**道书中这样描写智者:他从陆地上经过一些异邦的民族,受到各种善恶的考验。老爷,我的国王,我已经说过,但愿我能像个智者,而不是像个笨伯那样来完成这一切!许多人行事如智者,但是我没有智慧,非常愚蠢,实在担心能否成为智者中的一员!不过无论如何,我是这样做了。您对我说过,当我离开您的时候,要写信告诉您我在鞑靼人之中看到的一切,您还嘱咐我不要担心信写得太长。我谦卑而不安地完成了您嘱咐我做的事情,因为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词来给一位如此高贵的陛下写信。”

吉尧姆·德·吕布鲁克



“神 圣的国王尽其所能，极力说服我，一定要坚定不移地信仰上帝加诸我们的基督教戒律。他谆谆地说，我们应该坚守信条，即使面临死亡和肉体痛苦，在言行上也决不能有半点违背。”

苑安维尔
(Jean de Joinville)

《圣·路易史》
1309 年

德·吕布鲁克，一位弗朗德勒的方济会修士。这位修士正好也想向蒙古人传道。吉尧姆兄弟身穿棕色粗呢僧侣服，赤着双足，于 1253 年 5 月在君士坦丁堡上船，前往克里米亚的索尔达亚，身上带着一封给萨尔塔克(Sartak)的介绍信。萨尔塔克是拔都(Batu)的儿子；拔都是黄金部落的可汗，也是蒙古人向西方扩张的总指挥，他的营地在伏尔加河附近。据说萨尔塔克

已经受洗改宗,其实他似乎是景教徒。这封介绍信经萨尔塔克的亚美尼亚秘书们翻译之后,内容变得大有出入。此信对于承认基督徒的问题只是笼统提及,倒是明白表示,想和蒙古人进行军事合作,共同对付伊斯兰教徒。萨尔塔克不能擅自作主,便派吉尧姆兄弟去请示他的父亲拔都。拔都又派吉尧姆去见蒙哥大汗。蒙哥当时已在喀喇昆仑山继承了贵由的王位。

吉尧姆的路线和卡尔班走过的路线差不多。他于1253年12月到达喀喇昆仑山。不过,在途中他遗失了圣·路易的信件,蒙古人因而怀疑吉尧姆的身分,认为他不可能是使节或信使。但是吉尧姆为自己辩护,说自己是传教士,他的愿望只是想要生活在蒙古人当中“为上帝效劳”。他的愿望被批准了。不过为时很短,后来就被打发回去。蒙哥让他带回一封信,要求圣·路易归顺,并且派官方的使节前来。吉尧姆到阿克之后,方济会禁止他外出,他无法去见圣·路易,便给圣·路易写了一封长信《蒙古帝国之行》。

吉尧姆·德·吕布鲁克的记述十分有趣

吉尧姆的记述,比不上马可·波罗的书来得有影响力。但是此书观察准确,判断合理,堪称是部人类

“我们要让您知道永恒的上帝的命令。当您听到并且相信的时候,您如果愿意服从我们,就派您的使节来。这样我们就会确切地了解,您想与我们讲和或开战。由于永恒的上帝的力量,当整个世界从日出到日落,都统一在欢乐与和平之中的时候,我们要做的事情也就实现了。”

蒙哥可汗
致圣·路易国王的信





这幅细密画描绘在亚洲采集药草的方济会僧侣。中医在药草方面的丰富知识，给吉尧姆·德·吕布鲁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这些药草中，由撒拉逊人花费许多力气运到西方的大黄，最受青睐。吉尧姆·德·吕布鲁克自己在中国生了病，也用磨成粉末的大黄根煎汤来治病。不过他告诉我们，他喝了大黄汤之后差点没命。

学著作，而远非一本奇迹之书。他率先指出塞尔人的国家就是契丹，并且对各国民族的风俗、服饰、节日、宗教仪式都很感兴趣。他关心欧洲移民的命运，比如他就记录了那些德国奴隶的颠沛遭遇：他们先被流放到土耳其塔拉斯(Talas)，后来到准噶尔盆地的铁矿里做苦役。他和巴黎的金银匠师傅乔姆·布歇合作，由布歇的养子当他的翻译。他遇见来自梅斯的一个女人，名叫芭凯特，她正在为一位“信奉基督教的贵妇”效劳。他还遇见一个名叫巴西勒(Basile)的人，巴西勒的父亲是个出生于匈牙利的英国人。

吉尧姆想传播基督教的信仰，因此和景教徒发生冲突。景教徒用叙利亚语念日课经，却不懂叙利亚语。他们腐化堕落，放高利贷，是一帮醉鬼和重婚者，可

是都顺利地引荐给大汗，因为丞相不鲁该(Bulgai)和他长子的家庭教师一样也是景教徒。人们以为吉尧姆与其他景教徒没什么不同，吉尧姆对此十分恼火。他还苦于自己和亚美尼亚僧侣塞尔吉乌斯(Sergius)的对立，后来才知道，塞尔吉乌斯只不过是一个骗子。

只有很少的人改宗……

其实在大汗的宫廷里，没有哪一种宗教占优势。蒙哥本人就对吉尧姆·德·吕布鲁克说过：“就像上帝让手上长几个指头一样，他也给了人类几条道路。”实际上，蒙古人是随着各地情况不同，而选择了不同的宗教。有些在南俄罗斯或波斯的可汗，成了伊斯兰教徒，而在中国的忽必烈大汗则成了佛教徒。

和吉尧姆同时去见大汗的，还有两位旅行家。其中一位是波斯人朱凡尼(Juvaini)，他的父亲是阿尔干的一位大臣，任职科拉森(Khorassan)和伊拉克的总督。他于1252年到1253年之间，比吉尧姆·德·吕布鲁克早一点到达喀喇昆仑山，在那里写了一部《一位征服世界者的传记》。不久之后，刚于1254年登基的亚美尼亚新国王海敦(Héthoum)一世，也到蒙古人那里谋求一些好处。他于1255年返回。在吉尧姆·德·吕布鲁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除了波罗兄弟带着马可，以教皇使节和商人的双重身分二度前去旅行之外，便很少再有传教士去东方了。

北京的主教约翰·蒙高维诺(Jean de Montecorvino)为数千蒙古人施行洗礼

蒙古人既接待传教士，也接待别的宗教使节。教皇尼



教皇派遣约翰·蒙高维诺出使，是希望忽必烈皇帝改宗，但是徒劳无功。蒙古的可汗们已经选择了佛教。不过为此被派出的新总主教和副主教们，使大约2万名从高加索流放出来的阿兰人、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归顺了拉丁教会。



古拉四世(Nicolas IV)决定派一位新的密使,方济会修士约翰·蒙高维诺,让他带信去呼吁蒙古人成为基督教徒。约翰·蒙高维诺于1289年出发。他到达伊朗的商业中心大不里士(Tabriz)后,由于蒙古人之间起内战,他就没有走沙漠商队的道路,而取道波斯湾上船去印度。他在印度待了13个月,然后到中国去,于1293年忽必烈去世前不久到达汗八里。我们可以从他在1305年和1306年寄出的信里,了解他的活动。他在北京住下,然后把活跃在黄河流域地区的基督徒集中起来。接着,他不顾景教徒的袭击,在汗八里建立了一所教堂,为数千名蒙古人布道和施行洗礼。

他曾在信里请求教皇帮助。但是教皇派去的传教士只有一人到达目的地。不过在1307年,鉴于蒙高维诺促使蒙古人改宗有功,教皇决定一口气派遣六位新主教,从而使蒙高维诺成了汗八里的总主教。六位新主教中有三位在1313年到达中国。在此期间,蒙高维诺不仅使一些蒙古人受洗信教,也使一些其他

13 18年,方济会修士何德理

(Odoric de Pordenone)离开位于威尼斯西面的帕多瓦(Padoue)前往汗八里,在那里待了三年。他对旅行的记述不如吉尧姆·德·吕布鲁克的游记那么重要,但是他提到了一些新的事情:例如戴长指甲和“小脚”的用途。他是第一个提及西藏城市拉萨的欧洲人。由于一般读者迷恋于奇迹传说,因此对让·德·曼德维尔的书更感兴趣。其实曼德维尔大量剽窃了何德理书中的内容,反而使人以为何德理的书是伪造的。

民族的移民或商人,如俄罗斯人、亚美尼亚人等归顺了罗马教会。主教们没有明确的职务,但还是在泉州建立了一个教区。

然而主教们在中国好景不长

蒙高维诺在将近 1330 年时去世,他的职务当时无人接替。可汗本人也要求派一个继任者来。由于可汗的要求,教皇于 1339 年派出四名特使,由方济会修士约翰·马里诺利(Jean de Marignolli)率领。他们于 1342 年才到达中国,在带来的礼物中有一匹大马。这匹后蹄雪白的黑马深得大汗喜爱。他让人把马画下来,又命人为此作一首颂歌。但是约翰·马里诺利只是一位使节,而不是传教士,所以在汗八里待了三、四年以后,就取道印度回到欧洲。罗马教会不仅向中国传教,也一直在向波斯和整个亚洲传教。它向各地派出各种使节,说明了罗马教会在 13 和 14 世纪,确实

“在汗八里,小兄弟们有一所大教堂,就在宫廷旁边。教堂里有适合总主教住的寓所。城里还有其他教堂和钟楼。教士们正大光明地向皇帝领取生活必需品。”

约翰·马里诺利

致力于统一所有的
基督徒教会。





在 14 世纪,中国和基督教世界的联系突然中断

从 13 世纪中叶起,传教士和商人往还于欧亚之间的沙漠商队路线上,这种熙熙攘攘的局面在一个世纪之后消失了。原因很多,首先是 1348 年瘟疫在欧洲流行,另一个原因是蒙古人的政权在波斯和中国逐渐式微,领土被割据,边界也重新划分。中国从 14 世纪中叶开始,起义不断,终而产生了一个新的王朝,即明朝。明朝于 1368 年建立,到 1387 年统一了整个中国。

人们往往认为,随着明朝建立,中国采取排外政策而闭关自守。这种看法是谬误的。当时仍然有使节和沙漠商队到中国来。这方面的材料有吉亚特·埃德丹(Ghiyathed-Din)的《游记》,他在 1419 年至 1423 年是沙阿·罗赫(Shāh Rokh,中亚细亚帖木儿王朝的统治者,势力范围在今天的伊朗和土耳其)的使节。还有商人萨依德·阿里—阿贝·吉塔伊(Sayyid Ali-Akber Khitayi)的《中国纪行》,他在 1500 年左右可能来过中国几次。然而,当沙漠商队的路上人迹渐少时,取道海路来往的人却日益增加了。

“天 地不仁,也许是
由于人类的冷酷无情吧。瘟疫从 3 月到 7 月大肆流行,有太多病人得不到照料。健康的人担心会被传染,所以把病人抛在一边,不闻不问。我们敢说,城内死了十万多人。在灾难降临之前,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城里有这么多人。多少豪华的宫殿,多少高大的住宅,从前全是老爷、贵妇和仆人,现在连最卑贱的奴仆也都死去了!”

薄伽丘(Boccace)

《十日谈》

约 1350~1353 年



“所以在我看来，

契丹(Cathay)这个王国和中国没有什么不同。

波罗所说的伟大的国王不是别人，

就是中国的国王。因此中国早已为鞑靼人和波斯人所了解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。”

到了17世纪初，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终于做出这样一个研判。传说中的神秘东方国度，

从此成为活生生的一块土地。

在长达数百年的猜测和寻觅之后，

西方人找到了丝绸的故乡，

一个他们原来早就有所认识的地方。

第六章

航海家的时代

15世纪，航海术和地理学的发展，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。由于葡萄牙王子“航海家”亨利(Henri le Navigateur, 1394~1460)的努力，西方发现了一条海路，从印度洋绕过非洲，直达欧洲。

